

党建也是生产力*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研究

何 轩 马 骏

提要: 非公有制经济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新时期执政党工作的重要内容。那么,基层党建究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何种影响?具体作用渠道是什么?现有研究还相对匮乏。基于民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库,本研究对上述问题有如下发现:民企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这一过程的作用机理在于,党组织引导民营企业投入了更多的生产性活动。但出于对企业控制权稀释及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流失的担忧,家族涉入导致企业治理和决策受到干预,进而影响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本文展示了民企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为执政党“为何要”以及“如何能”增强非公有制党建工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体制下的民企内部治理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建议。

关键词: 党组织建设 民营企业 企业绩效 家族涉入

一、引 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民营企业在数量、规模、吸纳就业人数、国民经济总量比重和税收贡献等关键经济数据的表现,都说明民营企业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使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实际经营中发挥作用,如何从理论层面建构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机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家族企业与制度环境的共生演化”(项目编号71572051)、广东省教育厅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民营企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生性演化”(项目编号2016WZDXM026)、2018年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广东省创新引领的微观机制”(项目标号pdjha0006)的支持。马骏为本文通讯作者。本文曾在第一届西子论坛“地方社会治理与营商环境改善”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与会同仁的评论和建议。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2012年第十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有30.8%的企业已经建立基层党组织,比2002年增加了12.41%。^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党建工作多种方式,努力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企业……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执政党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重视程度。但在实践中,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往往受到所有制、经营方式、经营对象等因素的约束,党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在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是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存在的,其直接作用于企业内部,发挥政治核心职能。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Chang & Wong, 2004; 马连福等 2012, 2013; 陈仕华、卢昌荣 2014)。而在民营企业中,党组织有别于国有企业党组织,人、财、物均不直接管理,基层党组织发挥的是一种间接作用,具体体现在引导、监督、维权、统战、协调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李少斐 2008),其实质在于探索党组织建设和企业发展间的最佳结合。因此,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重心之一在于“围绕企业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那么,基层党组织建设究竟为民营企业带来了何种影响?梁建等(2010)发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能够引导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何轩、马骏(2016)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于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龙小宁、杨进(2014)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建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职工工资以外的福利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的确实为民营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良性影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国务院新闻办(国新办)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更是指出“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现象,不论是国有控股还是私营控股或混合所有制,这个公司只要注重

^① 数据来源:2002年和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

党的建设,这个公司业绩就好,立于不败之地”。^①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小民营企业,上述现象是否也同样存在?亦即,中小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建立能否有效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这是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进一步,如果基层党组织能够显著地影响民营企业的绩效水平,那么其中的具体作用渠道是什么?这是本文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最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可能还受到企业自身特质的影响。因此,本文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民营企业的内部因素(家族涉入程度)如何影响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水平提升间的关系。

本文可能具有以下三点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拓展了民营企业党建方面的文献。现有关于民企党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阐述和定性研究方面,虽然已有不少关于国企党建方面的实证文献(Chang & Wong 2004; 马连福等 2012 2013; 陈仕华、卢昌荣 2014),但私营经济党建研究迄今为止还缺少清晰的理论或模式分析,停留在对于国外理论或范式的总结和争论阶段,特别是民营企业这一重要的中国特色制度产物并没有正式纳入党组织建设的研究范畴。基于此,何轩、马骏(2016)率先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于民营企业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于民营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和效果。

第二,本文拓展了政治联系方面的研究文献。过去政治联系研究集中关注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企业家的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以及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忽视了组织层面的因素,比如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而在中国近现代政商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党组织的建设和渗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认为,个体层面的政治联系是一种“外向个体谋取型”政治纽带——企业主通过正式的政治身份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资源和产权保护等。相反,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则是一种“内向组织变革型”政治纽带,尽管它也能够通过组织资源和力量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和资源,但其作用机理还蕴含了通过党组织的融入变革内部组织体系,可以说是组织这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的一种自我变革,明显有别于目前政商关系研究中关注的企业家个体层面。

第三,本文拓展了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机制

^① 资料来源:搜狐网(<http://mt.sohu.com/20170227/n481811856.shtml>)。

直接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等内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产生作用,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现有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党组织对企业治理结构影响的文献大多基于国有企业样本(马连福等,2012,2013;陈仕华、卢昌荣,2014)。我们认为,不应忽视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因为党组织嵌入是执政党与民营企业间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这一常设机构同样可以提升民营企业的治理效率,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建立党组织与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互动沟通机制,党组织与董事会联席会议等制度实现,促使党组织的主张与企业的决策有效融合,进而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文献回顾和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前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概括本文的结论和研究贡献。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历史与现实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渗透及延伸就一直是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中之重,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的源泉(亨廷顿,2008)。但随着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迅速成长和集聚,其展现的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挤占了执政党的社会空间,削弱了执政党的渗透和延伸力量。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将民营企业统合到政党国家体系中,限制其潜在威胁的同时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经济社会建设功能,便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何轩、马骏,2016)。依照组织嵌入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组织建设原则,中国共产党从1993年正式开始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到民营企业中,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来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那么,效果如何呢?表1给出了2002-2012年全国范围内民营企业主政治身份以及企业中党组织建设的客观状况。从调查中可以发现,近10年来,具有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始终占被调查总数的30%以上且呈现上升趋势,没有入党的民营企业主对于入党的渴望也有所加强。同样的,从2002年开始,企业中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占比呈现上升趋

势 2012 年比 2002 年增加了 12.41%。至少从客观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过程是卓有成效的。

表 1 民营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入党意愿与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建立情况

调查年份		具有党员身份	有入党意愿	设立党组织
2002	总数	972	545	892
	比例	.299	.167	.274
2004	总数	1126	411	899
	比例	.313	.114	.250
2006	总数	1395	368	1129
	比例	.364	.096	.294
2008	总数	1372	421	1294
	比例	.335	.103	.316
2010	总数	1838	1043	1275
	比例	.398	.226	.276
2012	总数	1662	1666	1565
	比例	.328	.328	.308

注: 资料来自 2002 - 2012 年全国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

(二) 政治联系的表现形式及作用

我国政商关系的发展,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政策助推过程。从执政党统合的视角出发,目前我国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过程,赋予企业主政治身份;二是执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过程,在企业中设立基层党组织。就个体层面而言,党和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赋予企业主政治身份,一是中国共产党开放组织体系吸纳企业家入党;二是通过政治安排的方式赋予企业家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就组织层面而言,执政党将基层党组织嵌入到企业中。

以往的政商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主个人政治联系上。这些研究普遍发现,民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能够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胡旭阳,2006;余明桂、潘红波,2008)、产权保护(罗党论、唐清泉,2009)、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政府补贴(余明桂等,2010)、行业准入(罗党论、刘晓龙,2009)、关键资源的获取(Zhou,2012)等一系列“政治租金”,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和绩效(吴文锋等,2008;田利辉、张伟,2013)。但这些研究大部分以企业家个体层面的

正式政治身份以及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来考察政治联系,忽视了组织层面的因素,比如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而在中国近现代的政商关系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渗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认为,个体层面的政治联系是一种“外向个体谋取型”的政治纽带,亦即企业主通过正式的政治身份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资源和产权保护等。相反,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更多的是一种“内向组织变革型”政治纽带,尽管它也能够通过组织资源和力量从外部为企业谋取信息和资源,但其作用机理还蕴含了通过党组织的融入变革内部组织体系,可以说是组织这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合的一种组织自我变革,明显有别于目前政商关系研究中关注的企业家个体层面。比如,就国有企业而言,基层党组织拥有参与重大经营决策、雇佣、薪酬契约等的权力(马连福等,2012,2013;陈仕华、卢昌荣,2014),因此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有较大影响,具有治理机制的特征。而在民营企业中,基层党组织与“政”完全分离,不直接控制企业的资源,更多的是发挥监督、维权、统战、协调、引导的作用,通过协调社会、政府、职工等关系,帮助非公有制企业搞好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提升企业文化、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李少斐,2008)。虽然不直接控制资源,但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往往会参与企业的重要会议与决策过程,比如与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互动沟通,参与董事会联席会议制度的设立等。这些举措能够保证党组织主张与企业的治理和决策更好的结合,进而引导民营企业“围绕企业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

由此,我们认为,个体层面的政治联系和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表现出“外向个体谋取型”特征,而后者则具有“内向组织变革型”特征。事实上,民营企业党组织架设了民营企业和执政党互动的桥梁,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型政企互动关系。党组织嵌入是执政党与民营企业间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治理机制,其本质上不同于政治关联这类非正式的和个体与组织间的制度产物,不具有寻租性、功利性和投机性特征,其影响、机制和评价都需要具体讨论。

(三) 研究假设的提出

1. 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

尽管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不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中,但其可以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支持和促进企业的发展,最终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最新公布的浙江百强民营企业呈现一个普遍特征:企业(主)都非常重视党组织建设,并且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实现了业绩提升。比如,传化集团始终坚持“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理念;天能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强调,企业要“像搞研发一样抓党建”;海亮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冯亚丽进一步指出“海亮能有今天,与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是分不开的,党建工作是海亮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只有党建强,发展才有持续力;只有发展强,党建才更有说服力”。^①

通过以上几个典型的小案例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主)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而这一机构的嵌入也为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绩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党组织建设帮助企业提升绩效的作用渠道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一作用渠道在于,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鼓励民营企业(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到生产性活动中,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水平。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具有政策渠道功能,能够使企业主更好地掌握与企业发展相关联的信息和资讯,进而促进其对于生产性活动投入的意愿和信心。首先,党组织与党和政府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对各项政策法规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可以利用组织资源优势,及时、准确地将外部环境的有效信息传递给民营企业主,减少他们对制度环境的误判并降低适应环境变化的成本(何轩、马骏,2016)。尤其是通过与上级党组织建立的联系,基层党组织能够作为一种桥梁,使得民营企业更快、更全面地获悉党中央和省、市出台的扶持和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的政策措施,帮助其充分利用优惠政策以及市场供求信息,提升企业生产性活动投入的积极性。其次,基层党组织是企业主可以公开利用的政治信息渠道,当企业主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遇到困难(比如,企业生产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过度干预)时,通过这一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企业家可以同上级党委和政府直接对话(曹正汉,2006),及时反映自身的诉求与愿望,也更容易接受并得到回应。在当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企业家和政府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csj.xinhuanet.com/2017-08/31/c_136570051.htm)。

间的信息沟通更加顺畅,党组织这一信息“桥梁”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在这一背景下,民营企业主将更有意愿和信心进行生产性活动投入,而无需像以往那样,为了获得产权保护和必要的资源而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政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最后,被执政党选中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同类企业的佼佼者,企业主容易产生自我认同感的膨胀,但又缺少思想和行动约束机制,进而进行寻租等投机性行为(陈东,2015),将不利于民营企业专注生产、管理与创新等活动。此时,基层党组织拉近了企业主与政府、执政党的距离,这一信息渠道可以使企业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反腐运动中进行非生产性活动的成本,这种思想上的自我约束也会间接地约束他们的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行为。

第二,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具有吸纳优秀人才和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作用。首先,拥有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更加重视党员人才的引入,而党员往往又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群体,对他们实行优先招聘录用、优先提拔晋升、优先提高待遇,大力提升党员在企业中的地位,激发党组织发挥作用潜能,为推进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黄琦、容剑锋,2011),这些党员人才的储备也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创新活动中的中坚力量。浙江民营企业奥克斯集团的党建工作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奥克斯集团党委书记郑坚江指出,“奥克斯实现平稳、顺利、快速发展的一大秘诀就是党建工作。可以说,党建工作丰富了企业经营、管理文化,为企业引才聚才、凝聚人心、稳定队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①同样的,在万向集团中,年轻党员身兼“青年政治辅导员”,深入车间巡讲党课,与年轻员工谈人生,疏解工作压力,促进生产动力……在万向,党员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促进企业生产的重要源泉。其次,许多民营企业将内部非党员生产经营管理骨干职工吸纳进党组织,通过主动引导和培训,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人力资本优势。在此基础上,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具有优秀生产经营才能的党员人才能够积极参与到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王河,2002),为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提供人才保障。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具有担当信息沟通渠道和人才吸纳、激励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进而得以提升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

^① 资料来源:党务工作者之家(<http://www.wzlxdw.cn/plus/view.php?aid=103222>)。

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当企业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时,企业的业绩将受到何种影响?这是接下来需要关心的问题。

一般而言,当企业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比如生产经营、创新)投入时,企业的绩效将得到有效提升(Falk, 2012),这一论断在宏观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也得到了验证(Baumol, 1990; North, 1990; Sobel, 2008)。但在中国情境下,这一结论可能会受到质疑。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诸多缺陷,很多领域的经济租金短期内将高于生产创新等生产性活动的收益(周方召、刘文革, 2013),正式规则的缺失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关系网络成为企业战略选择的首要驱动力(Peng, 2003)。此时,日常经营和管理工作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保障因素,但并不一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何晓斌等, 2013)。由此,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可能并非总能提升业绩水平。故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待检验假设:

假设 1a: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能够加强民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意愿和能力,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假设 1b: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能够加强民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活动的意愿和能力,但无法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

2. 家族涉入影响下的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与企业绩效

相比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作用的发挥还会受到企业内部力量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企业家族涉入的影响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采用家族式经营。家族涉入企业是家族企业独一无二的特征,这包括家族所有、家族管理和治理等方面的涉入。家族涉入使家族管理者和家族成员拥有塑造企业目标、战略和行为的权力与合法性(Chrisman et al., 2012; Deephouse & Jaskiewicz, 2013),进而家族可以凭借其企业主的地位行使更多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Anderson & Reeb, 2003)。而我们认为,家族涉入程度越深,企业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受到的限制就越大。

随着家族所有、家族管理和治理等涉入的加深,家族网络的封闭性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人之间的信任主要存在于基于血缘或亲缘基础上的家族关系网络内部(福山, 2001),而对外部则有排他性。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进而认为,将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和参照点是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重要的区别所在(Gómez-Mejía et

al. 2007; Gómez-Mejía et al. 2011) 而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则成为保护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内容(Berrone et al. 2012)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家族企业往往会增加对股权的控制、安排更多的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和董事会, 由此带来两方面的结果。第一, 家族网络的封闭性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更多地服从家族和企业目标, 家族涉入程度越高, 家族和企业目标与党组织的政治目标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企业主往往会优先考虑家族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此时, 企业将把基层党组织排斥在核心的管理和决策层之外, 进而阻碍党组织信息沟通渠道作用的发挥。此外, 家族企业的优势之一是其本身具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能够为企业提供非制度保护(余明桂、潘红波, 2008; 吴文锋等 2009) , 家族成员也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来更好地识别和把握市场机会(Barney et al. 2002) 。此时, 这些丰富的网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党组织所能提供的信息和资源优势, 进而弱化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第二, 企业会排斥外部的社会资源, 而这些资源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比如人力资本资源。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吸收外部的优秀党员进入企业, 并将内部有能力的员工吸纳入党组织。但是, 家族企业往往具有非对称性的利他主义(Schulze et al. 2003) , 会将家族成员安排进企业或者管理层, 即使这些成员能力不足。与此同时, 为了保持家族的控制, 家族企业往往不愿意引入更有能力的外部职业经理人, 因此会削弱党组织吸纳优秀人才和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 家族网络的封闭性可能导致企业排斥家族外部的特殊资源, 从而丧失企业成长与发展的机会(Sirmon & Hitt 2003; Dyer 2006) 。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家族涉入的加深将削弱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信息渠道和人才吸纳、培育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 随着家族涉入程度的加深, 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将被弱化。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

研究会联合在 2010 年进行的第九次全国大规模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数据库,数据合法来源为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数据库。本次调查包含了我国境内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按 0.55% 的比例对民营企业进行多阶段抽样。共发放 4900 份问卷,回收 4614 份,总回收率为 94.16%。我们将变量存在明显不合理值以及存在缺失的企业样本剔除,最终得到 2183 家企业样本。

(二) 变量测量

本文具体变量的测量(即原始问卷中的问题)和编码方法如表 2 所示。

1. 因变量

企业绩效。在考察企业绩效时,现有研究主要采用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规模成长、绩效主观评价等作为代理变量。本文将企业“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取自然对数。

2. 自变量

基层党组织。如果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则定义为有基层党组织的企业,否则定义为未设立党组织的企业。

3. 调节变量

家族涉入。一般而言,家族涉入包括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入、董事会涉入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Anderson & Reeb, 2003; Zellweger et al., 2013; Deephouse & Jaskiewicz, 2013; 陈凌、陈华丽, 2014; 李路路、朱斌, 2014; 朱斌, 2015)。本文主要考察家族所有权的涉入和家族成员董事会的涉入。家族所有权涉入是指家族成员所掌握的所有权益与企业总的所有权益之比。家族成员董事会的涉入是指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比例。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企业家层面,包括企业家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党员身份、政治身份、制度环境感知。第二个是企业层面,包括企业年龄、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治理结构、上年度绩效水平、行业类型。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地区和市场化水平。

表 2 变量测量与设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因变量	企业绩效	企业的净利润和销售收入 取自然对数。	
自变量	党组织	来源: 在您的企业中, 有无下列组织? (①股东会, ②董事会, ③监事会 ④中共党组织 ⑤工会 ⑥职工代表大会) 设计: 重新编码虚拟变量, 若选择④, 则赋值 1, 其他选项为 0。	
调节变量	家族涉入	家族所有权涉入	来源: ①2009 年底企业所有者权益中, 您自己占权益总额比例为多少(%)? ②2009 年底企业所有者权益中, 您的家族成员占权益总额比例为多少(%)? 编码: (① + ②) / 100。
		家族董事会涉入	董事会成员中家族成员个数比例。
控制变量	企业家性别	男性编码为 1, 女性编码为 0。	
	企业家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 减去企业家出生年份。	
	教育程度	分别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依次赋值为 1-6。	
	党员	若企业家是党员, 则编码为 1, 否则编码为 0。	
	政治关联	若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则编码为 1, 否则编码为 0	
	制度感知	来源: 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制订了一系列支持和引导个体、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 对改变企业经营环境起到了什么作用? ①放宽市场准入; ②缓解融资困难; ③加大财税支持; ④支持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⑤支持创业创新; ⑥完善社会服务; 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⑧改进政府监管; ⑨加强指导和政策监管。 九项问题回答 1 = 作用显著 2 = 作用不明显 3 = 没有作用。 编码: 将九个指标反转后加总平均。	
	企业年龄	以问卷调查时间为基准, 减去企业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的年份。	
	企业规模	企业员工人数, 取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董事会规模	企业中董事会人数, 加 1 取自然对数。	
	两职合一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个人, 则编码为 1, 否则编码为 0。	
	上年度绩效	企业上一年销售净利率。	
	市场化水平	各地区滞后一年的市场化总指数, 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11)。	
地区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所在省市自治区, 重新编码为 30 个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进行虚拟变量转换, 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等 19 个行业, 重新编码为 18 个虚拟变量。		

四、数据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3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从表 3 可看出,企业党组织与净利润水平正相关。就控制变量来看,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具有党员和政治身份、两职合一、制度环境感越好的企业家所在企业绩效水平更高。就企业层面而言,企业经营时间越长、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高、董事会规模越大、上年度绩效越好,企业的净利润水平越高。

(二)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STATA12.0 进行数据处理,以检验前文假设。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模型估计。调节效应的检验分别采用分组回归和交互项的方式,其中交互之前将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所有回归方程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1. 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

表 4 报告了企业绩效对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2)分别为以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净利润($\beta = 0.331$, $p < 0.01$)和销售收入($\beta = 0.325$, $p < 0.01$)均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好的绩效水平。

为了验证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倾向匹配得分法(PSM)处理内生性问题。(1)2SLS。本文考察的企业中设立党组织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党组织变量可能与模型中的残差项相关。其次,企业的绩效和成长可能也会影响民营企业中是否设立党组织。严重的内生性将使得模型的估计系数有偏和不一致,故需要对模型进行内生性问题的检验。我们选择企业“开办时的资产规模”作为党组织的工具变量。一般而言,企业规模与党组织的建立有着直接关系,那些组织规模更大或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更可能被党和政府“选中”,在其中设立党组织。虽然企业开办时的资产规模可能会对当时的企业业绩产生影响,但可能

N = 2183

表 3 变量的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净利润	1.000														
2. 党组织	.441*	1.000													
3. 性别	.084*	.089*	1.000												
4. 企业家年龄	.154*	.206*	.078*	1.000											
5. 教育程度	.249*	.184*	-.028	-.146*	1.000										
6. 党员	.149*	.279*	.077*	.197*	.119*	1.000									
7. 政治关联	.358*	.319*	.078*	.153*	.148*	.094*	1.000								
8. 企业年龄	.230*	.176*	.066*	.256*	.010	.011	.279*	1.000							
9. 企业规模	.478*	.321*	.127*	.152*	.127*	.089*	.273*	.162*	1.000						
10. 资产负债率	.186*	.197*	.085*	.093*	.047*	.070*	.113*	.056*	.231*	1.000					
11. 董事会规模	.318*	.369*	.088*	.144*	.191*	.153*	.215*	.094*	.395*	.143*	1.000				
12. 两职合一	.105*	.169*	.085*	.118*	.085*	.120*	.104*	.057*	.185*	.082*	.447*	1.000			
13. 上年度绩效	.074*	.023	-.006	.011	-.005	.024	.031	.014	.036	-.029	-.006	-.033	1.000		
14. 制度感知	.110*	.083*	.055*	.063*	-.039	.053*	.074*	.011	.125*	.071*	.052*	.027	-.020	1.000	
15. 市场化水平	.117*	.033	.042*	.053*	-.030	.006	-.039	.139*	.068*	.090*	-.024	-.027	.008	.001	1.000
均值	3.864	.308	.870	45.993	3.846	.409	.443	8.979	3.861	18.217	.782	.471	.067	2.343	8.338
标准差	2.145	.461	.336	8.713	1.088	.491	.496	4.547	1.617	28.125	.795	.499	3.101	.468	1.964

注：* p < 0.05。

并不会具有持续作用并延续到现在。基于此,我们以企业“开办时的资产规模”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表4中模型(3)和(4)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净利润和销售收入均显著正相关,表明本文的结论相对稳健。

表4 基层党组织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回归方法	(1)	(2)	(3)	(4)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净利润	销售收入
	FGLS		2SLS	
党组织	.331 ^{***} (3.06)	.325 ^{***} (3.18)	8.338 ^{**} (2.31)	10.52 ^{**} (2.43)
性别	-.023 (-.29)	.083 (1.09)	-.101 (-.47)	-.029 (-.12)
企业家年龄	-.002 (-.57)	.011 ^{***} (3.01)	-.024 [*] (-1.91)	-.016 (-1.11)
教育程度	.126 ^{***} (3.85)	.095 ^{***} (3.12)	.047 (.47)	-.0138 (-0.12)
党员身份	.011 (.16)	.048 (.75)	-1.25 ^{**} (-2.11)	-1.553 ^{**} (-2.19)
政治关联	.325 ^{***} (4.18)	.378 ^{***} (5.13)	-.326 (-.93)	-.574 (-1.30)
企业年龄	.016 ^{**} (2.14)	.013 [*] (1.80)	.008 (.44)	-.006 (-.29)
企业规模	.666 ^{***} (22.55)	.909 ^{***} (32.56)	-.181 (-.44)	-.270 (-.55)
资产负债率	-.0006 (-.54)	.0067 ^{***} (5.87)	-.005 (-1.34)	-.0017 (-.33)
董事会规模	.075 (1.38)	.090 [*] (1.74)	-.582 [*] (-1.80)	-.774 [*] (-1.94)
两职合一	-.142 [*] (-1.89)	.033 (.47)	-.139 (-.77)	.102 (.49)
上年度绩效	.321 ^{***} (6.73)	-.001 (-.14)	.079 [*] (1.65)	-.030 (-1.51)
制度感知	.185 ^{***} (2.92)	.089 (1.51)	.043 (.26)	.005 (.03)

续表 4

回归方法	(1)	(2)	(3)	(4)
	净利润	销售收入	净利润	销售收入
	FGLS		2SLS	
市场化水平	.463*** (3.12)	.344** (2.48)	.148 (.44)	-.049 (-.12)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650*** (-3.84)	-1.533 (-1.34)	2.719 (.70)	6.610 (1.42)
样本量	1986	2154	1986	2154
Prob > F	30.59***	63.76***		
Adj R ²	.4762	.6401		
Wald χ^2			616.15***	923.55***
R ²			.4019	.5392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2) 模型(1)和模型(2)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 模型(3)和模型(4)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Z 统计量。

(2) PSM。我们采用倾向值配对的方法(PSM)来处理内生性问题(Heckman et al., 1998)。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评估某一行为或特征时,通过倾向得分值(PS值)找到与处理组相似的控制组进行配对分析,此时样本选择偏误就可以被有效降低,同时能够减弱控制变量等可观察因素对考察变量的影响,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

首先,本文使用 Logit 模型对匹配变量进行筛选,参与筛选的匹配变量为本文回归模型中出现的所有控制变量,解释变量为 0-1 虚拟变量,1 代表企业内建立了党组织,0 代表企业内未设立党组织,同时控制了地区效应和年度效应。然后,基于 Logit 模型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倾向得分值(PS值),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PS 值进行配对。最后,我们采用“对被处理单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来估计党组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ATT 回归结果显示,ATT 平均处理效应为 0.450,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的,第三行报告了党组织对销售收入的 ATT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ATT 平均处理效应为 0.307,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最近邻匹配方法”按照 1:4 的比例进行配比,我们还分别按照 1:1、1:2、1:3 的比例进行配比,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且,我们采用“半径匹配方法”配对技术获得的结果与上述结果也没

有实质性改变。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企业和地区特征的影响后,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比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绩效水平更高。因此,在控制了模型内生性问题以后,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2. 党组织建设促进企业绩效的渠道: 生产性活动的中介作用

我们认为,生产性活动在党组织建设与企业绩效间充当中介机制。为了检验这一猜想,我们建立了模型“党组织—生产性活动—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其中,生产性活动的测量采用研发投入作为替代变量,取自然对数。为了检验上述中介模型,本文参照温忠麟等(2005)的做法,分三步来检验相关系数:第一步,将企业绩效对党组织进行回归;第二步,将生产性活动对党组织进行回归;第三步,将企业绩效对党组织和生产性活动进行回归。表5报告了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1)–(3)报告了以净利润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部分调节了党组织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模型(4)–(6)报告了以销售收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结论与上述结果相符。以上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对绩效的提升部分是通过鼓励企业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投入来实现的,亦即,企业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是民营企业党组织挥发作用的重要中介渠道,本文假设1a得到支持。

表5 “党组织—生产性活动—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净利润	生产性活动	净利润	销售收入	生产性活动	销售收入
党组织	.331 *** (3.06)	.506 *** (6.29)	.209* (1.95)	.325 *** (3.18)	.506 *** (6.29)	.262 ** (2.56)
生产性活动			.230 *** (8.11)			.124 *** (4.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650 *** (-3.84)	-1.292 (-1.43)	-4.262 *** (-3.57)	-1.533 (-1.34)	-1.292 (-1.43)	-1.373 (-1.20)
样本量	1986	2154	1986	2154	2154	2154
Prob > F	30.59 ***	17.69 ***	32.16 ***	63.76 ***	17.69 ***	63.64 ***
Adj R ²	.476	.321	.493	.640	.321	.643

注:(1)* $p < 0.1$, ** $p < 0.05$, *** $p < 0.01$ 。(2)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
(3)受篇幅所限,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统计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3. 调节效应的检验

表6报告了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模型(1)–(3)报告了以净利润为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家族所有权涉入的交互项显著为负($\beta = -0.0073$, $p < 0.05$),党组织与家族董事会涉入的交互项为负但不显著($\beta = -0.349$, $p > 0.1$)。模型(4)–(6)报告了以销售收入为替代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组织与家族所有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的交互项均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涉入显著削弱了党组织对绩效(净利润)的提升作用,亦即,家族涉入对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产生了约束作用。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表6 家族涉入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党组织	.331 *** (3.06)	.336 *** (3.11)	.111 (.82)	.325 *** (3.18)	.317 *** (3.11)	.039 (.34)
家族所有权涉入		.0001 (.08)			-.003 ** (-2.24)	
党组织×家族所有权涉入		-.007 ** (-2.20)			-.0005 (-.18)	
家族董事会涉入			.205 (1.52)			-.101 (-.86)
党组织×家族董事会涉入			-.349 (-1.47)			.322 (1.55)
性别	-.023 (-.29)	-.025 (-.31)	-.009 (-.06)	0.083 (1.09)	.103 (1.34)	-.11 (-.86)
企业家年龄	-.002 (-.57)	-.002 (-.66)	-.011* (-1.78)	.011 *** (3.01)	.010 *** (2.92)	.004 (.84)
教育程度	.126 *** (3.85)	.123 *** (3.74)	.173 *** (3.38)	.095 *** (3.12)	.089 *** (2.93)	.159 *** (3.66)
党员身份	.011 (.16)	.004 (.05)	-.070 (-.68)	.048 (.75)	.044 (.68)	.099 (1.12)
政治关联	.325 *** (4.18)	.338 *** (4.35)	.406 *** (3.66)	.378 *** (5.13)	.391 *** (5.29)	.583 *** (6.06)

续表 6

	(1)	(2)	(3)	(4)	(5)	(6)
	净利润	净利润	净利润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
企业年龄	.016** (2.14)	.016** (2.13)	.012 (1.02)	.013* (1.80)	.013* (1.88)	.011 (.99)
企业规模	.666*** (22.55)	.663*** (22.44)	.696*** (15.15)	.909*** (32.56)	.907*** (32.46)	.926*** (22.87)
资产负债率	-.0006 (-.54)	-.0007 (-.60)	-.0001 (-.05)	.006*** (5.87)	.006*** (5.75)	.007*** (4.57)
董事会规模	.075 (1.38)	.059 (1.08)	.591*** (3.76)	.090* (1.74)	.0695 (1.32)	.390*** (2.86)
两职合一	-.142* (-1.89)	-.133* (-1.77)	-.123 (-1.09)	.033 (.47)	.032 (.46)	-.007 (-.08)
上年度绩效	.321*** (6.73)	.319*** (6.69)	.161*** (3.40)	-.001 (-.14)	-.0004 (-.05)	-.001 (-.19)
制度感知	.185*** (2.92)	.184*** (2.90)	.339*** (3.24)	.089 (1.51)	.084 (1.42)	.094 (1.05)
市场化水平	.463*** (3.12)	.462*** (3.10)	.033 (.14)	.344** (2.48)	.382*** (2.74)	.097 (.50)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650*** (-3.84)	-4.596*** (-3.79)	.416 (.21)	-1.533 (-1.34)	-1.754 (-1.53)	-.553 (-.33)
样本量	1986	1986	1036	2154	2154	1136
Prob > F	30.59***	29.76***	16.19***	63.76***	61.98***	32.00***
Adj R ²	.476	.477	.480	.640	.640	.632

注: (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2) 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

4. 进一步分析: 企业绩效变量的替代^①

在上文中, 我们使用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指标, 但这两个变量与企业规模有着非常密切关系(尤其是销售收入), 学者们常常用它们作为测量企业规模的指标, 因此可能导致本文的关键结

^① 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一部分检验中, 我们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倾向匹配得分值法(PSM)进行模型估计, 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而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并没有获得与上述两种方法相一致的结论, 这可能与我们的工具变量(开办企业时的资本规模)的选择有关。

论受到质疑。为了使得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我们进一步采用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作为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党组织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但对销售净利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我们按照上文的倾向值配对的方法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ATT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企业和地区特征的影响后,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比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绩效水平(主要体现在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更高。

最后,我们分别采用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作为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生产性活动中介作用的检验。表7的结果显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引导企业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活动实现的。^①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a。

表7 “党组织—生产性活动—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4)	(5)	(6)	(7)	(8)	(9)
	资产净利率	生产性活动	资产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生产性活动	净资产收益率	销售净利率	生产性活动	销售净利率
党组织	.264** (2.31)	.506*** (6.29)	.239** (2.07)	.238** (2.01)	.506*** (6.29)	.203* (1.70)	.005 (.02)	.506*** (6.29)	.011 (.04)
生产性活动			.042 (1.37)			.0594* (1.86)			-.010 (-.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927 (.74)	-1.292 (-1.43)	1.055 (.85)	1.000 (.77)	-1.292 (-1.43)	1.242 (.97)	1.434 (.53)	-1.292 (-1.43)	1.420 (.52)
样本量	1947	2154	1947	1947	2154	1947	2154	2154	2154
Prob > F	1.52***	17.69***	1.53***	1.42**	17.69***	1.46**	3.53***	17.69***	3.47***
Adj R ²	.016	.321	.016	.013	.321	.014	.066	.321	.066

注:(1)* p < 0.1, ** p < 0.05, *** p < 0.01。(2)模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3)受篇幅限制,只报告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

① 模型(3)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活动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此时,需要进行Sobel检验(温忠麟等2005),回归结果通过了Sobel检验,表明生产性活动中介了党组织建立与资产净利率。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库,分析了民营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对企业绩效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如下:首先,相比于没有基层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绩效水平更高。这一过程的作用渠道在于,基层党组织通过其组织资源优势,鼓励民营企业投入更多的生产性活动,最终提升了企业的绩效水平。其次,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了基层党组织发挥信息渠道和人才吸纳以及培育的作用,进而削弱了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首先,对于执政党而言,如何利用组织资源优势,将党组织嵌入到民营企业中,对其进行监督和引导,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发展并承担必要的社会功能,是执政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任务。从现实来看,近十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超过三成的民营企业在组织内部建立了党组织。而且,这些基层党组织能够利用组织资源优势来引导民营企业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的成长绩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政党应该继续坚定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其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政商关系研究集中关注企业家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以及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联系,忽视了组织层面的因素,而在中国近现代的政商关系发展脉络中,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渗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个体层面的政商关系更多地表现出人格化、非正式的特征,因而存在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寻租腐败活动。而作为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基层党组织有着较为严格的组织规范和规则,长期导向的、非人格化的、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政治联系能够防止寻租腐败的滋生,继而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提供组织支持。

再次,对民营企业而言,基层党组织的嵌入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民营企业应适时、主动积极地靠近执政党,具体表现在强化党组织建设、激发党组织活力。但是,当家族涉入程度过高时,党组织的作用发挥空间会受到限制,对于绩效的提升作用也会被削弱。此时,家族企业可以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选择合适的上级党组织对企业内部的基层

党组织进行监督和管理,进而使家族内部资源与党组织资源更好地融合起来。此外,在新时期,除了企业家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以及与官员的非正式联系,组织层面的基层党组织也是政治联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且基于组织层面的联系是一种更加正式的、健康的政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渠道不仅包括谋取个体层面的政治身份,同时还包括组织层面的基层党组织建立,将两者有效结合,将是未来政商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

实际上,中国民营企业与执政党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互惠性和情感性的“关系”纽带。这种纽带使民营企业家形成并巩固了与执政党的长期互惠关系以及彼此具有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它们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共生的演化关系(何轩、马骏,2016)。而基层党组织能够作为这种关系纽带的渠道和桥梁,增进执政党和民营企业(主)的政治互信,这对于我国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曹正汉,2006,《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及组织结构之演变》,张曙光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五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陈东,2015,《民营企业出资人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管理世界》第8期。
- 陈凌、陈华丽,2014,《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 陈仕华、卢昌荣,2014,《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管理世界》第5期。
-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中国市场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福山、弗朗西斯,2001,《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 何晓斌、蒋君洁、杨治、蔡国良,2013,《新创企业家应做“外交家”吗?——新创企业家的社交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管理世界》第6期。
- 何轩、马骏,2016,《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第5期。
- 塞缪尔·亨廷顿,200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旭阳,2006,《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管理世界》第5期。
- 黄琦、容剑锋,2011,《民营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及其规律——以东莞为例》,《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期。
- 李路路、朱斌,2014,《家族涉入、企业规模与民营企业的绩效》,《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少斐 2008,《经济制度变迁与党的组织资源开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 2010,《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管理世界》第7期。
- 龙小宁、杨进 2014,《党组织、工人福利和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证据》,《经济学报》第2期。
- 罗党论、刘晓龙 2009,《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 罗党论、唐清泉 2009,《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 2012,《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管理世界》第5期。
- 田利辉、张伟 2013,《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第11期。
- 王河 2002,《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第2期。
-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2008,《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第7期。
-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 2009,《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第3期。
- 余明桂、潘红波 2008,《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第8期。
-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 2010,《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经济研究》第3期。
- 周方召、刘文革 2013,《宏观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述评》,《金融研究》第12期。
- 朱斌 2015,《自私的慈善家——家族涉入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社会学研究》第2期。
- Anderson, R. C. & D. M. Reeb 2003, “Founding-Family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S&P 500.”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8 (3).
- Barney, J. B., C. Clark & S. Alvarez 2002, “Where Does Entrepreneurship Come From: Network Models of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Family Fi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ories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 Philadelphia, December.
- Baumol, W. J.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 Berrone, P., C. Cruz & L. R. Gomez-Mejia 2012,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ssessment Approaches,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5 (3).
- Chang, E. C. & S. M. L. Wong 2004, “Political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Listed Fi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4).
- Chrisman, J., J. H. Chua, A. W. Pearson & T. Barnett 2012, “Family Involvement, Family In-

- fluence , and Family-Centered Non-Economic Goals in Small Firms. ”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6 (2) .
- Deephouse ,D. L. & P. Jaskiewicz 2013, “Do Family Firms Have Better Reputations Than Non-family Firms? An Integration of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ies.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0 (3) .
- Dyer ,W. G. 2006, “Examining the ‘Family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 ”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9 (4) .
- Falk ,M. 2012, “Quantile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R&D Intensity on Firm Performance. ”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9 (1) .
- Gómez-Mejía ,L. R. ,C. Cruz ,P. Berrone & J. Castro 2011, “The Bind That Ties: 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 ”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5 (1) .
- Gómez-Mejía ,L. R. ,K. T. Haynes ,M. Núñez-Nickel ,K. J. L. Jacobson & J. Moyanofuentes 2007,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1) .
- Heckman ,J. ,H. Ichimura & P. Todd 1998,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 ”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5(2) .
- North ,D. C. 1990 , *Institutions ,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ng ,M. W. 2003,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 (2) .
- Schulze ,W. S. ,M. H. Lubatkin & R. N. Dino 2003, “Toward a Theory of Agency and Altruism in Family Firms. ”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4) .
- Sirmon ,D. G. & M. A. Hitt 2003, “Managing Resources: Linking Unique Resources , Management , and Wealth Creation in Family Firms. ”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7 (4) .
- Sobel ,R. S. 2008, “Testing Baumol: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 ”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 (6) .
- Zellweger ,T. M. ,R. S. Nason ,M. Nordqvist & C. J. Brush 2013, “Why Do Family Firms Strive for Nonfinancial Goals? A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Perspective. ”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7 (2) .
- Zhou ,W. 2012,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2) .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公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何轩)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公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马骏)
责任编辑: 杨 典

MARXIST SOCIOLOGY

Do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 *He Xuan & Ma Jun* 1

Abstract: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on-public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ruling party in the new period. Questions such as how the building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ffect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what is the mechanism still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Private Business Investigation database , this paper has several finding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firm performance , and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is that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an guide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invest more productive activities. However , due to fear of dilu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and loss of socioemotional wealth , the governance and decision-making are interfered by the family involvement , which will weaken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valid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to private enterprise work , which provides the ruling party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on “why” and “how to” strengthen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on-public economy. Meanwhile , it develop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ice for private enterprise on how to set up a better inter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MONOGRAPHIC STUDY

Economic Sociology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Right of Recourse” *She Xiaoye* 25

Abstract: The property rights issue such as the compensation after land requisition usually arises after the nominal property rights being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